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天人古今 / 古代通论 / 综论、民族、区域 /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结构及其演进轨迹的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结构及其演进轨迹的思考

2006-08-30 葛金芳 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 点击: 468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结构及其演进轨迹的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结构及其演进轨迹的思考

葛金芳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

今年(2005)年初,我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期上发表的拙文中,首次提出了“同质社会”假说,但未及展开论述。在我看来,自先秦至明清,长达三、四千年的我国古代社会,可以按其经济形态划分为四种先后相续的同质社会。这就是(一)以“井”、“邑”即村社共同体为基础的先秦族群社会;(二)以“编户齐民”即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汉唐吏民社会;(三)工商业文明在农业社会母胎内全面成长的宋明租佃社会;(四)插在汉唐和宋明之间的辽金元(西夏亦应包括在内)社会则带有程度不等的游牧文明色彩,又是一种自成体系的同质社会;(五)而清朝则是宋明社会和辽金元社会的大幅度综合,这个综合的重大成果就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内地农耕文明与周边部族的游牧文明互渗互融、相交相合,从而奠定了今天拥有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现代中国版图。

这几种同质社会以一个否定一个的方式传承下来,其间既有区别(性质相异)、又有联系(新旧杂陈),还有转折、交叉和融合。从先秦族群社会向汉唐吏民社会的转折发生在战国时期,而春秋时段已见端倪,主要是井田制瓦解、小农阶层的出现和宗法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化;从汉唐吏民社会向宋明租佃社会的转折发生在晚唐五代时段,而中唐已见端倪,主要是均田制瓦解、租佃关系发展、工商业文明的快速成长和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

公元10至13世纪,契丹、党项、女真等周边游牧部族迫于气候(第三寒冷期)等原因逐步深入黄河流域,内地农耕文明的经济重心随之南移到长江中下游,更加靠近东南沿海出海港口,海外贸易日趋繁荣。宋代特别是南宋的两浙、福建、广南等地,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得以崛起并初步成形,于是汉唐时期“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汉唐大陆型帝国至此向两宋海陆型帝国转型。这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路向及其内在特质的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中国社会已然处于近代化的前夜,或者说早在北宋中叶以降,近代工商业文明的曙光已经依稀可见。这比欧洲至少要早三、四百年。

遗憾的是,宋代、明中叶、清中叶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上一再启动的都市化、商业化和原始工业化进程,却未能结出现代化的正果,其最为直接的原因当然可以归之于战争的干扰。12世纪初女真铁骑频频南下,饮马黄河;13世纪由蒙金战争拉开帷幕,中原和江南屡遭蹂躏。其后虽在元朝统治下复归统一,但领主分封制、匠局制(实即工农制)和“驱口”、“人市”等前封建制因素死灰复燃。这些落后因素在明初社会打下深深的烙印,一直要到明中叶城市化、商业化和原始工业化

- 史观史论
- 历史理论
- 领域视野
- 方法手段
- 规范学风

☐ 史料索引

- 古今文献
- 考古文物
- 简帛文书
- 回忆追述
- 社会调查
- 论著索引

☐ 论著评介

- 通论文集
- 古代史著
- 明清史著
- 近代史著
- 现代史著

☐ 动态信息

- 期刊网刊
- 网站网刊
- 团体机构
- 学术会议
- 研究动向

☐ 他山之石

- 世坛综考
- 美国史坛
- 西欧史坛
- 东亚史坛
- 其他地区

☐ 池月山云

- 文史随笔
- 知识小品
- 诗词诗话
- 文艺点评
- 小说演义
- 史眼世心

进程才重新启动。然而明末清初又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其时战火尚在燃烧，又伴之以圈地狂潮，城市社会经济再次受到重大打击，北宋以来一再启动的原始工业化进程也屡遭打击而奄奄一息。18世纪的康乾盛世虽然持续了百余年的和平，但人口从一亿狂增至四亿，社会经济陷入了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Involution)陷阱。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到制度环境中去寻找。海内外学者经数十年之比较研究，发现近代化诸因素的成长不仅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而且需要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孕育和容纳；更需要一个趋向民主化的宪政秩序加以支撑和呵护。当代新制度经济学已经证明，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仅就明清而言，大一统的专制集权政体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政治衰退倾向(如皇帝不理朝政，宦官操纵朱批，朝内朋党相争，文字狱愈演愈烈等)；国家不知保护民众产权反而大肆摧残工商业活动(如矿监税使)；不知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反而一再“禁海”、“迁界”；看不到市民阶层的发展前景，反而将其中的佼佼者通过科举制度纳入到旧式官僚体制中去。于是原本是原始工业化进程之推进主体的工商业阶层反而被异化为封建官吏，各级城市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堡垒而失去了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至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在实现其“伦理学转向”后愈加精致却又愈加内敛，一面用“存天理、灭人欲”来愚弄百姓，一面用“君权神授”、“朝纲独揽”来取媚君主。笔者曾将这些弊端称之为“制度性缺陷”。而此时西方已经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而蓄势待发，1840年后的中国便不可避免地陷入落后挨打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责任编辑: ecoadmin

- [发表评论](#)
- [查看评论](#)
- [加入收藏](#)
- [Email给朋友](#)
-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